

“黔之为黔” ——追寻黔学研究的向上一路

◆ 周兴杰^①

摘要：讨论对黔学的认识，应有必要的目的遵循和问题域规定。分析关于“黔学”的认识分歧，有助于阐明黔学应然的学术追寻，逐步生成其学术肌理。探讨贵州人文精神等命题，都是在叩问“黔”之为“黔”，是追寻黔学研究的向上一路。

关键词：黔学 “黔之为黔” 学术肌理

一

自20世纪90年代贵州前辈学人从准学科意义上提出“黔学”概念以来，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在几代贵州学人的努力下，黔学从队伍发展、体制建设到学术研讨等几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设立黔学研究院，并每年举办学术会议，定期结集出版《黔学研究》，使黔学研究有阵地、有队伍、有成果，就是这一进步的明证。另一方面，不得不说，当前的黔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亟待提升之处。正如范松所言：“黔学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那以后，一些学者曾就历史上的黔学做过不少个案探索，取得了相应的学术成果。但……我们对黔学的认识与探讨，仅只停留

^① 周兴杰：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诗学。



在感性与零星的状态。”^①应该承认，范松所指的状况在今天的黔学研究中仍然存在。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对黔学的认识和探讨仍然是感性和零星的呢？这个问题必须从当前人们对黔学的认识谈起。

在讨论对黔学的认识时，我们有必要重视黔学研究者张新民提出的意见。张先生是从地域学的角度来理解黔学的，他提醒道：“现在我们一谈到什么‘学’，就必须用西方的概念来定义，甚至套用自然科学的现成方法，似乎人文学的任何研究都必须清晰地加以界定。其实与哲学、史学、文学等专业分科学科不同，地域学的概念是比较松散的，凡涉一地之山川、历史、人物、文化等等都应该研究，也都可以纳入其范围，它是宽泛意义上的学问而非专门性的学科，因而很难以单一学科的概念来加以严格界定。”^②的确，西方的“学”的概念，是建立在西方学科分类基础上的，如果完全从西方意义上来理解和运用“学”的概念，那就是一种削足适履的思维方式。比如，“国学”一词，就是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的总称，涵盖了今天所谓的文史哲多个学科，如果从西方的学科意义上来看，则显得过于庞杂，难以成立。但不争的事实是，“国学”已然成立并在实际中被很好地运用。因此，我们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学”的概念，以此来界定诸如国学、湘学、徽学、蜀学，乃至黔学，而应在一种相对宽泛和灵活的意义上来使用它。正如我们之前就提出的，“黔学”应作为一种“泛学科建构”：“‘黔学’概念的泛学科内涵的敞现，带来的是其建构向度的明确化。这种明确化包含了将‘黔学’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组织形式的扬弃，即不必刻意依据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目标的标准，在沟壑纵横的现代知识生产机构内部发起一场新的圈地运动。”^③换言之，打破西方意义上的学科藩篱，更有利于我们构建黔学的学术共同体。

但是随之而来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许多贵州学人的人文学术研究无

① 范松：《黔学与黔学研究刍论》，《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21期。

② 张新民：《地域学术与黔学》，《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周兴杰：《“黔学”：概念辨析与泛学科建构》，周之翔、徐适主编：《黔学研究（2017）》，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7页。

须经过任何转换，“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黔学研究。也就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黔学变成了贵州民族学、阳明学、贵州历史文献学等等学术研究的一种集合。平常，大家各行其是，到进行黔学研讨时，大家也就都成了黔学研究。这当然有利于扩大学术队伍，形成以“黔学”为旗帜的学术共同体。但是，这样一来，在这个学术成员联盟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内部却是缺少必要的学术肌理的有机联系的。比如，如前所述，国学研究包含了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多个领域，因此，国学研究者会去研究中国文学。但是中国文学研究者一般不自认为是国学研究者。即使有个别人这样认为，也在学界内部和相应的社会领域内得不到普遍承认。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学研究者一般自知，尽管中国文学作为对象也是国学的一部分，但是，他做的研究的基本目的遵循，是文学的规律性问题，或者说为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所规定，而与国学研究的目的和问题域有所区别，因而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学研究者。说得再具体一点，在研究中国文学作品时，中国文学研究会更关心作品的审美性问题，如音韵格律等，而国学研究者则更关心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二者虽有交集，但并不同一。同样地，黔学研究离不开对贵州文学的关注，但是贵州文学研究者不等于就是黔学研究者。如果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实际上就是以本已有之的贵州文学研究来替代黔学研究（至少是部分替代），而缺少必要的目的遵循和问题域的转换，从而难以形成黔学共同体内必要的学术肌理联系。这就是范松所言的目前黔学研究“感性与零星”的状态的原因。这也说明，尽管我们认为黔学是一种泛学科建构，但过于宽泛，则不利于推动黔学的系统化和长足发展。

二

由上述分析可知，探索当前局面下的黔学发展仍然有必要回到“黔学”所“是”的问题。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不必拘泥于西方学科意义上的“学”，但仍然有必要思考究竟什么是黔学。而我们思考的目的，是寻找当前黔学学术共同体内在的学术肌理。



关于“黔学”所“是”的问题，研究者们已经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对“黔学”也下了多个定义。在此，我们无意去一一梳理这些概念，而是试图指出，人们对黔学的理解是存在一定分歧的，而分析这些分歧，有助于厘清对黔学的认识，更为清楚地把握其泛学科外延，进而阐明黔学应然的学术追寻，逐步生成其学术肌理。

其中一个重要分歧是，黔学究竟起于何时？

一种说法是“两汉起源”论。如豫章书院黔学研究中心编写的《黔学概述》中就写道：“黔为贵州省简称，黔学为贵州地域历代学术文化的总称。春秋战国时期的牂牁、夜郎，文化遗存极少，有学术著述及文学作品记载，当起于两汉。”^①这是第一篇给黔学定位的文章，在黔学研究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此后，张连顺更为明确地指认《尔雅·舍人注》为“黔学”奠基之作：“黔学是指从古典到现代发生于黔地由学术活动而形成的学术成果与学术研究之总称。黔学以发轫于西汉汉武帝刘彻时代黔地学者犍为文学卒史舍人的经学研究为起步……”^②

另一种说法则是“史前起源”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范松，他提出：“黔学是贵州之学，是以今贵州为主体的特定自然生境为依托，在漫长社会发展进程中，渐次形成、发展、传承下来的一种极富山地高原特点、民族特征、独特属性的地域文化。”“诞生于东亚山地高原特殊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下的黔学，不仅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空间上则以贵州山地高原为主体，涵盖巴蜀之南、鄂西南、湘西、桂北等广大地区。”^③

还有一种是“明代起源”论。如邹芳望认为：“大体来说，黔学兴起于明代，这时的学者几乎都处于阳明心学的笼罩下。”^④

① 豫章书院黔学研究中心：《黔学概述》，参见“豫章书院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gzyzsy>。

② 张连顺：《“黔学”奠基之作〈尔雅·舍人注〉及其相关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③ 范松：《黔学与黔学研究刍论》，《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21期。

④ 邹芳望：《黔学的形成及其转折》，《社科纵横》2019年第2期。

面对这三种不同观点，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呢？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应该看到，时间向度的认识分歧其实与空间向度的认识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它与我们如何认识“贵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必须承认，黔学就是贵州之学。但是，“贵州”并非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的概念，而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我们在讨论黔学时，尤其是从后一种意义上出发来认识“贵州”的。只有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如许多学者提出的那样，“黔学不归属于自然科学，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且以人文科学为核心主体”^①。不止于此，从人文地理的意义上来审视“黔学”概念，我们才更能明确，它的成立需要两个重要的前提，其一是“黔”的地理空间意识的觉醒，其二是必要的学术品格。

既然称之为“学”，当然应该有其学术品格。而为什么需要以地理空间意识觉醒为前提呢？关于这一点，正如周之翔所言：“黔地在明代建省以前数千年，没有作为一个具有某种统一的特性的地理空间而为人们所认识，而是经过数千年各方势力之间的经济、军事、文化等的长期互动，到明王朝时期，人们才意识到黔地无论作为行政区划还是作为文化、经济与族群的承载地，本身都是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尊重这个地理空间，王朝与黔地之间才能更好地和谐相处……作为独立的地域空间意识的觉醒，‘黔’直到明朝才实现……”^②我们认为，其中至少包含了两重意思：一是“黔”作为地域空间的概念其实是存在发展变化的，而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人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二是今天意义上的“黔”其实是黔地之人与黔地之外的其他中国人相互确认的结果，黔地之人已自认为“黔人”，所居之地为“黔地”，黔地之外的人亦然。由此才能谈得上“黔”的地理空间意识自觉。也就是说，有了这份自觉，“贵州”才成其为“贵州”，关于“黔”的文化认同才得以构建，而并非这块大地亘古有之，就自然而然成其为“贵州”了。

① 张连顺：《“黔学”奠基之作〈尔雅·舍人注〉及其相关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② 周之翔：《贵州觉醒的历程：从地理空间觉醒到人文价值觉醒》，周之翔、徐适主编：《黔学研究（2017）》，2021年，第52—53页。

“贵州”成其为“贵州”，作为“贵州之学”的“黔学”才形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就此而言，邹芳望的黔学“明代起源”论更有说服力。而“两汉起源”论重视了黔学的学术品格，却忽视了其形成所需的地理空间意识的觉醒，“史前起源”论则实际上是从物理空间角度来考虑黔学内涵问题的。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史前起源”论注意到了古今“黔”地内涵之变，但落脚点却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涵盖，而未注意到“黔”的地理空间意识觉醒之后的人文价值对黔人治学的内在驱动作用。而且，这一观点也忽视了黔学应有的学术品格。故而，三说之中，以黔学“明代起源”论更有说服力。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还须做一个重要补充，那就是，尽管我们基本同意黔学应在明代以后才形成，但是，黔学研究者对明代之前的黔人治学成果和诞生、留存于贵州大地上的地域文化仍然应敞开怀抱予以研究，因为这是黔学诞生的重要学术源流和文化母体。这不仅是承认黔学与此前的贵州大地上的学术传统和地域文化的有机关联，而且是为了分说清楚黔学与二者的关系。第一，在传承的意义上，我们所谓之“黔学”与二者是传承的关系而非同一的关系。就如同我们承认某人其父母所生，在分析其人的品性时会考虑其父母对他的影响，但我们不会把某人与其父母三者当作同一个人。第二，在研究的意义上，我们所谓之“黔学”尤其需要重视研究此前的学术传统和贵州地域文化，为什么尤需如此，已如上所述，但两者的关系应该犹如地质学与地质构造的关系，后者构成前者的研究对象，但不可与前者混为一谈。如此才能说，尽管我们承认黔学是一种泛学科建构，但其外延也是相对限定的。

对黔学的理解中，除起源认识分歧之外，还有黔学究竟是一种学术还是一种文化的认识分歧，以及黔学应该是“黔地贵州的国学学术”还是“亦包括经学之外的发生于黔地贵州的其他类学术”的认识分歧问题，其实都已包含在起源认识分歧之中，故不在此再做展开。

三

我们对上述辨析再做一个简单归纳，那就是，黔学是贵州之学，是“贵州”成其为“贵州”后才形成的黔人之学术。因此，黔学的形成，或者说，“黔学”欲成其为“黔学”，应内在包含或者致力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黔”之为“黔”的问题。明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才能在广泛联系贵州地域文化研究和贵州各种人文学术活动的基础上，完成思想萃取、精神提炼和学理构建，才能逐步改变黔学研究感性而零星的研究局面，生成黔学内在的学术肌理。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问题不仅内在包含在此前的黔学研究之中，而且实际上已经为有的黔学研究者明确提出并尝试解答了。笔者目力所及，黔学研究者周之翔的《贵州觉醒的历程：从地理空间觉醒到人文价值觉醒》^①一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有益探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周之翔在文中明确提出：“黔学是以发掘和弘扬贵州人文精神以服务于贵州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地域性学科。”^②这其实是从“黔学何为”的角度对“黔学何是”的新界说，它已经不是囿于时间和空间范畴的经验描述，而是“黔”之为“黔”的另一种表述和当下展开了。

文中，周之翔提出，从贵州发展史特别是从其内含的价值觉醒来看，黔学经历了五次大的“飞跃”，即“明代地理空间的构建与觉醒”“清代黔人修黔志的身份意识觉醒”“民国初黔人建黔学会的文化觉醒”“当代‘多彩贵州’提出的文化主体意识觉醒”，以及当前“贵州人文精神”的提出。笔者以为，这是对黔学发展脉络最为清晰的勾勒，是“黔”之为“黔”的思想历程和认同深化过程的具体展开，对于黔学研究走向系统化有着重要意义。

在价值觉醒的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周之翔对贵州人文精神特别做了阐发：“贵州以‘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为内涵的人文精神中，‘天人合

① 周之翔：《贵州觉醒的历程：从地理空间觉醒到人文价值觉醒》，周之翔、徐适主编：《黔学研究（2017）》，2021年，第52—53页。

② 同上书，第57—58页。

一’表征着贵州高原上天人之间的关系，既是塑造贵州多元地理空间与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内在动因，也是这种多元性、多样性的共同本质所在。‘知行合一’表征着黔地人人关系，即指人们之间、不同族群之间依照共同的道德良知相处，而实现多族群、多文化风俗的多姿多彩风貌；也指人依其善良本性与自己相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①的确，对贵州人文精神的表述，一方面是对贵州多样性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共同本质的提炼，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以经学为代表的国学传统之于贵州人文价值构建的根本性影响，二者交融映照了贵州人文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涵。而且，笔者以为，论者将贵州人文精神的提出置于贵州发展的价值觉醒谱系中来把握，是对“黔”之为“黔”的生成性和当代性的具体呈现。这样的认识思路，才是真正做到了谢孝明所言，黔学研究既是“对贵州地域文化与学术之肇始、发源、滥觞与形成的历史脉络、过程、内涵、特点”的梳理，又包含了“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做的历史考察和现实观照”，如是，方能使黔学成为融会“文化回望、学术探讨、学理建构、价值判断、思想萃取、精神提炼、固本开新的系统性研究课题”^②。具体说来，从贵州人文精神构建角度出发探索黔学，有助于古今融通，地域、民族与贵州整体融会，展开黔学的系统性研究，并呈现其当代价值。

当然，我们不妨坦言，“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其实是中华人文精神构建的重要内涵，贵州人文精神包含于其中，而应还有其特殊规定性。因此，对贵州人文精神的探讨似仍可深入。但无论如何，提炼、探索贵州人文精神，或者与此相关的命题研讨，都是在叩问“黔”之为“黔”，是追寻黔学研究的向上一路。

① 周之翔：《贵州觉醒的历程：从地理空间觉醒到人文价值觉醒》，周之翔、徐适主编：《黔学研究（2017）》，2021年，第57页。

② 谢孝明：《黔学研究小议》，《教育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